

■绿色地球

节能新思维：“全面抗战”

——循环经济随笔之十一

节能减排几乎已成了老生常谈，但是情况却总难让人乐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首季我国GDP增长速率为11.1%，能源生产总量增长12.1%。两相比较，能源生产总量增速高了1个百分点。显然，去年下半年节能减排所取得的一些实效，已完全被对冲了。更关键的是，首季我国原煤产量增速还要高于能源总量的增速2.7个百分点，煤炭燃烧对环境的污染较大，给环境保护带来更大压力。

客观地讲，节能减排是一把双刃剑。不实施节能减排，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问题。而严格地实施节能减排，中短期经济可能又会受影响，毕竟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节能减排做得好、经济仍保持高速发展的先例。这就使我们面临着严峻选择：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究竟哪个应成为政策首选目标？如果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环境保护难度就会非常

大；如果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速度！

是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上和熊掌兼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理论上讲，可能的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即迅速提升高附加值、节约能源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降低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比重；二是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减少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是减少排放和保护环境的最佳途径。我国的有关数据分析，也是如此。以2002年为例，我国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为4.75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值（1978年价），而服务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为2.38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值，正好为前者的一半。这表明，只要加速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服务业比重，我国经济的耗能量就能较快下降。然而，产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发展策略处处长



业结构的演化有其自身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周期，重化工业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撇开重化工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没有乔木支撑的蔓藤，难以获得向上拓展的空间，最后将使工业和服务业同时受阻，经济必然陷入停滞。

这么说来，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开发，似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华山一条道”。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因工艺技术落后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单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美国的2.1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8个主要耗能工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气候相近国家的2至3倍；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倍以上；我国现有各类电动机总功率约4.2亿千瓦，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相当于每年多消耗电约1500亿千瓦时！差距如此之大，则节能的潜力当然就相当大。比如说，我国有什么总是成功？显然，运行效率只有65%左右，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至20个百分点，通过技术改造和完善管理等措施，仅燃煤锅炉一项的节能潜力就有7000万

◎丁栋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何，思维方法是否对头，是创造活动成败的关键。而一定的思维方法一旦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种思维“框架”，对人们的思维活动起着规范作用，引导人们对外界的信息去选择、过滤、吸收、加工处理，形成结论。创新性的思维方法能帮助企业家发现真实，开阔思路，增强思维的敏感性，提高思维的效率。有的企业家为什么总是成功？就是在他的大脑里有一种自己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基于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模式，优秀的企业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感觉到和行事，而这，是一个领袖级企业家最重要、最根本的能力。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法，只不过是是否自觉，是否科学而已。用Charles Handy的话说是，人们心里都有一些“未曾表达、未加梳理，但却根深蒂固的组织模式”。获得这些模式的地方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参与的第一个组织，比如学校、军队或家庭，或者，也可能是他们早年看过的书籍和电影。这些经历让人们了解到什么是权威、怎样待人接物以及怎样自我表现。有形的束缚与挣脱，无形的牵挂系一生。错误的思维方式是最强大的力量，它会有惯性，驱使企业和企业家往明知错误的方向走。

4

在上述中国民营企业与企业家成长严重不足的问题背后，凸显的是企业家的思维出现了问题，往往习惯于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处理问题，许多企业家思维片面与幼稚，感性而非理性，感觉而非量化，注重结果而非过程，由此建立在经验感觉基础上的决策与制度，往往导致经营结果的随机。而这正是我们企业和企业家的软肋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这么多年，一个重大的误区那就是我们常常谈论的上市、融资、追寻人才，或者科技创新等等，原来这些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企业生存所需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能保证你的成功，这些要素要产生价值，必须完全服从一个能够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思维，否则，这些要素更有可能让你迅速沉沦。正因为企业家深谙传统的思维误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都很短命，中国企业也就出不了大的企业家。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企业内部环境也要发生改变，变化就会带来问题，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做而是怎么想。中国企业家真想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就非得破除以往的惯性思维不可，否则永远远逊人后。

比尔·盖茨说过：“你的思维，决定你的成败”。

■边走边唱

企业家如何越过思考这道窄门

1

先说一则令人感到苦涩的笑话。在某国际学校里，老师给各国学生出了道题：“有谁思考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粮食紧缺的问题吗？”学生都答“不知道”。非洲学生不知什么叫“粮食”；欧洲学生不知什么叫“紧缺”，美国学生不知什么叫“其他国家”；中国学生不知什么叫“思考”。

教育的实质是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企业家特殊的职能，要求其必须具备有区别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的学校从来不教这些，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都是与实践和思维分离的知识。结果，我们不会用思考直接驱动自己的能力提升、行为优化与实践创造，只会把自己被动地交给价值冲突糅合成的无数信息（经验、案例、理论……），把企业被动地交给市场裁决。企业家们一天到晚对企业员工说“要这要那”，却从未问过自己“我”究竟是谁？

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就少。”那么，引导企业家怎样思考的这道窄门究竟是什么呢？

2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9月26日发布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国落后印度11位排名第54，而时隔不到一个月，10月21日哈佛全球商业竞争力排名推出，中国更被置于落后印度37位的第64名。两个权威机构的排名招致不少国人非议。我们很容易在广场宽阔、城市漂亮、GDP高位、经济增长快速上获得满足，但是，在创新能力、商业环境、金融市场、教育、吏治、环保等一系列指标上，我们明显落后。排名固然有其本身的弱点，但是两次权威排行榜结论类似，足以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中国企业家将何去何从？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30年（1950-1980）中，涌现了大批世界级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深大、堤义明等，以及一批享誉世界的品牌如松下、丰田、索尼、尼康、富士、三菱重工、日立等，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6年，至今却鲜有世界级企业和企业家出现？这到底是什么？全球华人拥有的财富总和已远远超过了全球犹太人的财富总和，但是犹太人早已拥有了众多巨型企业。可是，世所公认的华资巨型企业、华人大企业家在哪里呢？

一定是某个基本面上出了大问题，或者出了一个大基本错误。我们暂且放下对宏观环境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反思，而从企业经营的微观视角，透视中国企业的思维，以求寻找部分答案。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说：“对现在无知和对过去无知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我们无知到何种程度的无知却不可原谅”。

3

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的成长。优秀企业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具有创造性思维。创业难，难就难在创新和变革这一关，谁能迈得过去，成功之门就会为谁打开。在创业过程中，



蒋玉磊 制图

据推测，按照我国目前节能技术发展形势看，到2010年我国节能技术可能达到3亿吨标准煤。尽管如此，与节能的需求相比，通过节能技术能够实现的空间依然不够。按照2010年的发展目标，届时我国所需要的节能量很可能会超过7亿吨。

另外，技术开发是不确定性很大的探索性实践，按技术开发的一般规律，风险很高，失败可能性非常大，而且有可能多次失败。因此，企业投资从事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很有可能血本无归，“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企业不能不考虑的第一点。还有，技术开发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根据美国的经验，企业技术开发投资回报率在20%至30%之间，社会回报率则高达50%，而节能减排技术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则更大。凡此种种，都使企业开发节能减排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那么，2010年经济耗能强度下降20%的目标还有望成功吗？显然，若按照前面的分析，答案几乎是否定的。我们还有什么良策呢？

事实上，就目前而言，在生产技术领域节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技

术开发、再制造业等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制约，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进展。而在消费领域只要政策措施得当，则有可能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在消费领域节能，需要人人都行动起来。除了改变人们的消费观，抑制奢华生活风气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绿色消费观念，改变消费方式和习惯。如果将夏季室内空调设置调高1℃，可节约用电5%至8%，按2002年家庭空调数量计算，可节约用电56万千瓦小时；如果每天少用空调一小时，则可节约用电870万千瓦小时。有研究表明，在基本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单是在住房、汽车、摩托车和家用电器节能这几项就可以节约居民生活用能的11.0%。

我们必须改变节能思路！如果把节能看成是一场“抗战”，现在采取的方针只是“正面抗战”。而为了获得胜利，我们必须“全面抗战”！不仅在生产环节节能，还需要在消费领域节能。而且，即使在生产领域，我们不仅需要提升产业结构和开发技术，还需要转变生产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发展高技术的制造业，还需要发展再制造业等等。

■斜阳芳草

“资本流动怪圈”源于先天不足

海外投资者以FDI形式大量投资我国，形成高利润回报汇出国外。而我国双顺差形成巨额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市场，只收取低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是在为美国的“双赤字”提供无限贴息贷款。奇怪的是，美国人明明享受了中国廉价商品和低成本资金，却偏偏还一天到晚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解决“资本流动怪圈”，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和海外投资基金等，仅仅是扬汤止沸的表面功夫，治本之策还是尽快改革国内金融结构的缺陷。

跨国资本似一股暗流在不断侵蚀中国经济的河床。一方面，国内储蓄水平很高并不缺乏资金，但每年总有大量的国外资金通过FDI流入。另一方面，国外资金内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最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大量外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净流出国——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多年来一直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相生。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去年中国对外资产总额已达1.55万亿美元，比前年多出3420亿美元。对外资产包括官方外汇储备、海外直接投资、在外资银行的存款、证券组合投资，及对非中国居民的贷款。其中最主要的是外汇储备一项，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一半以上投资于美国国债。到2006年底，中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已达3500亿美元，美国政府机构债券达2300亿美元。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多得输出了吗？既然资金剩余，那为何还有大量的FDI流入？所有这些疑问并不能在实体经济上找到完整答案。

全球第一大资金净流出国是日本，经常账户巨额顺差形成的外汇，通过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等渠道又重新外流，导致资本账户逆差，因此总体上保持了国际收支的平衡。但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保持顺差，资金流出是通过政府积累外汇储备投资海外来实现。

笔者以为，之所以形成这种“资本流动怪圈”，正是我国金融结构上先天不足的外在反映，这表现在银行体制、资本市场、汇率制度以及资本市场管制等诸多方面。首先“资本流动怪圈”的形成与我国银行信贷体制未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有关。我国金融体系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国有银行垄断为主，低生产率水平的国有部门往

往获得较多的资金，高生产率部门只能得到较少的资金甚至根本得不到资金。这种低效率的银行信贷体制造成的结果，除了国有银行积累大量的不良资产以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储蓄无法顺畅地转换成投资，形成巨大的“储蓄——投资缺口”。而在资金上弥补这个缺口的是正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我国近30年来一直对FDI采取鼓励政策，再加上财政分权，地方政府为寻求高速增长，上上下下为“招商引资”不遗余力，导致国外资金大量流入，造成资本账户顺差。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法律体系很不完善，在资本账户上只能实行严格管制，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无法通过“证券投资”这一渠道实现，就只能以FDI这种单一形式。近几年，在我国所有的外资流入结构中，FDI占了95%的比例。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出口企业在有了外汇收入之后只能卖给中央银行。中国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个项目上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重新流向海外。美国目前面临着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的困境，成为全球最大的资金净流入国。海外投资者以FDI形式大量投资我国，形成较高的利润回报汇出国外。而我国双顺差形成巨额外汇储备，政府将它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市场，却只收取较低的国债利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是在为美国的“双赤字”提供无限的贴息贷款。然而奇怪的是，美国人明明享受了中国廉价商品和低成本资金的好处，却偏偏还一天到晚骂娘，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

人民币汇率当然有问题，但它决非造成美国巨额外部赤字的主要原因，却与我国“资本流动怪圈”的形成



◎丁聘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博士生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存在很大关系。一般地讲，实行固定或盯住汇率制的国家都要比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都要保有更高的外汇储备，以利通过外汇市场干预保持汇率稳定。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上仍然以盯住美元为主要特征，由于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人民币遭遇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压力，国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游资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经常账户）渗透到国内。往年正常年份我国的贸易顺差维持在300至400亿美元，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猛增至1300亿，2006年又增至1700亿，这种不正常的顺差显然与国际热钱大举流入有关。对此，中国政府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巨大账面损失；但如果人民币保持缓慢升值的状态，国外游资还可能继续流入，以至于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这显然又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这样，我们成为美国的“人质”与美元牢牢捆绑在一起，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要解决好这个矛盾，短期内恐怕并不容易。从根本上来讲，要消除“资本流动怪圈”，还要在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结构的完善方面下功夫，而这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今后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必定要改革，人民币如果走向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资本账户必须开放；而要开放资本账户，又必须以本国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为前提。现在我们解决“资本流动怪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应对巨额的外汇储备问题，因此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和海外投资基金等，其实这些仅仅是扬汤止沸的表面功夫，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是尽快改革国内金融结构上的缺陷。

泰罗不幸：他说不却被当作标准

■官商之间

在欧美，科学管理是从在理性指导下安排人的一切活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在中国，赛先生在“五四”时被大张旗鼓地引进，为科学管理铺平了道路。但是，无论中外，科学管理在工厂都遇到了强劲阻力（或许可以说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更大些），除了习惯的惰性以外，它还遇到了道德，遇到了人对异化为机器的反抗。而这种相互冲突的欲望造成了人们普遍的焦虑和痛苦，众所周知这种痛苦在欧洲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动荡。正如科学管理是对劳资双方的理性的要求一样，这种痛苦也同时折磨着劳资双方。最初，资本家以为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包括劳资问题在内的很多问题，但是实践证明，这条路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被压榨的、苦难的生活日日在他们身边上演，折磨着他们的神经，使他们的荣耀和财富蒙羞，他们还必须克制欲望，把自己的人生纳入理性轨道，成为整个生产的一部分，还要抵御舆论对他们的道义谴责。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这些焦虑和痛苦。



◎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1912年，由于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泰罗被召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泰罗在国会说：“不能把科学管理理解为任何一种效率措施，……也不能理解为任何一批或一群效率措施。不能把它理解为计算成本的一种新制度，一种计件工资制度，一种奖金制度，一种分红制度，一种计酬方案。不能把它理解为拿着一只秒表观察一个工人并把他的作为记载下来。不能把它理解为就一群工人的动作印制一两吨的表格，把这些表格发给他们并说‘这是你们的制度，应用它。’不能把它理解为分工工长制。”他有些恼怒地说道“不能把它理解成一般人讲到科学管理时心中所想到的任何一种措施。”不幸的是，从中国的科学管理实践中，泰罗不希望看到的这种理解却被当作标准的科学管理原理。

即便退一步说，要实现让工人的工作遵从理性的安排这样的管理目标，管理者所创立的管理原则也应该彻底地以工人的行为和经历为基础。泰罗说在科学管理制度之下由管理当局主动承担起来的四种责任和负担的第一种就是：“由管理人员有意识地搜集原来存在于工人头脑中和体力技能及诀窍中的大量传统知识。这些知识是工人通过长期经验积累起来的。”但是事实上，工人的这种知识和经验并没有成为科学管理的基础，而是在反对工人的陋习时被一同抛弃了。

60多年前，费孝通在主持的一项工厂调查中转过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在一个夜晚，我居然在厂门前一家馆子里遇到三位退厂的技工，我们讲起了某某管理员，那位绍兴人就气冲牛斗，一面说先生怎样不行，一面又抱恨他埋没了自己的功劳。据说有一次钉螺丝钉，按着那个管理的方法做，累试不成，这位绍兴朋友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把三个螺丝钉用东西夹住同时敲，居然一举成功。那位管理先生不但不加赞赏，反而去向厂长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于是惹起了这群工人的忿恨。“在工程师们自上而下的高压式的科学管理之下，工人们引进了一种古老的手工艺人的观念，认为技术是自己吃饭的本领而秘不外传。他们依仗这种绝活和工厂、管理人员周旋。工人的“诀窍”和“经验”非但不能公开、合理化，反倒更大程度地成为一种秘密的知识。这个故事故事生动地说明，技术工人本应是科学管理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何以却成为科学管理的敌人。

似乎可以说新式企业家对工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实际上，在中国近代，企业家为工人的福利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当他们努力的收效甚微时，却又极端冷漠。似乎他们当初的努力只是为了使自己身心得到安慰。原因或许在于，企业家对工人生活的介入是以简单强制为主，既不重视工人的经验，也不重视工人的需求。他们并没有从工人已经取得成功的方式中寻找更有力的突破口。

工人要求企业家对他们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在中国近代，整个社会舆论始终支持这样的要求。比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调查中说：“吾们工人的缺点，的确不少；现在拿我个人所见的，分列两大纲：一、没有知识。二、缺少公德心。不过这二种缺点，我却又要归罪于资本家了。因为做父母兄长的，苟其家道宽裕，断乎没有不使他的子弟，多读几年书，到大起来成一个通人达士的。”这篇调查以旁观者的口吻直接用“父母兄长”来比拟企业家，用家庭伦理来要求企业家。

今天在我们的企业中，这种伦理错位似乎已罕见了。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家阶层无疑还是担负着人们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因此，就与民众的关系而言，企业家还是常常感到苦恼。在政府和政党面前，企业家觉得自己只是民众的一份子，民众的弱小、恐惧，他们都深有体会，甚至更为深刻，但民众并不这样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回分解。